

# 谈偶然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 ——以安史之乱与王忠嗣遭贬黜为例

王 军

**摘 要** 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该问题的考证上,本篇文章既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又根据恩格斯、汤因比等历史学家的观点,从偶然性因素(王忠嗣遭贬黜事件)改变唐廷兵制入手,对安史之乱爆发原因重新论证。但并非主张历史演进没有必然性和规律性,而是旨在说明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历史的演进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安史之乱 王忠嗣 兵制 偶然性

**作者简介** 王军,西北大学,初级职称,硕士。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92(2011)05-238-02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世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对唐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历史演进都有着重要影响。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有诸多方面,如:陈寅恪先生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傅安华先生的“经济相侵说”;吕思勉先生认为:“玄宗对蕃将的过度信任”;岑仲勉先生说:“由唐廷言之,错在边兵失调,过度信任安禄山而招其野心;由禄山言之,则是为当时中国经济繁荣所诱惑”;浦立本先生认为:“杨国忠与安禄山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心向朝廷造反”。上述原因,无不在安史叛乱爆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论者多把叛乱原因归结到唐廷政策之不合理,亦正确,但这只强调了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性因素起着根本作用的同时,偶然性因素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

《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载:“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为兵。”可见,兵制对国家安危存亡之重大关系。然而唐自建国至开元盛世近百年,皆未发生大规模叛乱,自睿宗始设节度使为正式官职至玄宗初年,亦未发生大规模叛乱,一方面与节度使皆“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唐廷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应与节度使都摄于唐廷合理的兵制有关。然而,维系唐廷百年安稳的兵制是如何被打破的呢?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王忠嗣贬黜乃至冤死对打破唐廷合理的兵制有深刻的影响。

### 一、王忠嗣生平及贬黜原因考析

王忠嗣,华州郑人,始名训。九岁时,父王海宾战死,玄宗怜其忠,赠左金吾大将军。王忠嗣因之见玄宗,玄宗更赐今名,养于禁中。及长,雄毅寡言,有武略。开元二十八年,以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职位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又加云麾将军。二十九年,代韦光乘为朔方节度使,仍加权知河东节度事。之后田仁琬充任河东节度使,忠嗣依旧为朔方节度。天宝三年,充任河东节度使。天宝五年,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佩四将印,控制万里,统兵合计二十六万七千之多,自唐建国以来,未之有也。王忠嗣不仅智勇兼备而且品质高尚,在唐军中有极高的威望

和地位,有“儒将”之称,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优秀忠诚,与权臣以及晚年的玄宗发生了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这些矛盾都在王忠嗣遭贬黜上集中爆发出来。

首先,与权臣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与宰相李林甫的矛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载:“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唐廷有边将入相的传统,开元以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唆、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皆由边帅入相。而时为封疆大吏的王忠嗣,无论是在个人能力还是功劳、威望上都远胜于宰相李林甫。《新唐书》记:“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钜樵过咎”。李林甫面对这样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利,除掉王忠嗣势在必行。

其次,晚年的玄宗好大喜功,喜好逢迎,甚至穷奢极欲。对内急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不断向边防将帅施压,挑起民族战争。作为边防重要的将帅,王忠嗣也迫于玄宗和朝廷的压力或者兵将的要求,发动一些对少数民族的战争,虽百战百胜,但王忠嗣却主张持重安边,不生事,史载:“及居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这种持重安边的思想和“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的黩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恰此时,石堡城事件发生,这对矛盾便在“石堡城事件”中激化,终成为王忠嗣罢黜的重要原因。

再次石堡城事件。《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三》载:“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玄宗因不快。六载,董延光献策请下石堡城,诏忠嗣分兵应接之。忠嗣偃俯而从,延光不悦……及延光过期不克,诉忠嗣缓师,故师出无功”。从材料中可以看出,王忠嗣所作所为与“有吞四夷之志”的玄宗做法是格格不能相入的,矛盾激化是必然的。恰此时出现攻取石堡城失利,董延光上告王忠嗣之罪过,李林甫、安禄山之辈排除异己,阴人告之,曰:“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怒,交三司会审,几陷极刑,后为哥舒翰以官爵赎罪,玄宗怒稍解,随贬为汉阳太守。天宝七年,暴病而死,终年四十五岁。

王忠嗣因“青蝇之点,几危其身”。忠嗣与权臣及帝王的一系

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偶然性的石堡城事件中得以激化,最终导致了这位“御寇之功,存乎方策”的边塞重将遭贬黜。

### 二、王忠嗣罢黜前的唐廷兵制配置及其分析

天宝初年,唐当时边疆设有节度使和经略使,兵制配置如下:

安西节度使 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 统兵二万四千人 马二千七百匹。

北庭节度使 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 统兵二万人 马五千匹。

河西节度使 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 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 统兵七万三千人 马一万九千四百匹。

朔方节度使 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 东西受降城、安北 不单于二都护府 统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马一万四千三百匹。

河东节度使 统天兵、大同、横野、崑崙四军 云中守捉 统兵五万五千人 马一万四千匹。

陇右节度使 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武、威戎、漠门、宁塞、积石 镇西十军 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 统兵七万五千人 马一万六千匹。

范阳节度使 统经略、武威、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 唐兴、横海九军 统兵九万一千人 马六千五百匹。

平卢节度使 统平卢、卢龙二军 榆关守捉 安东都护 统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马五千五百匹。

剑南节度使 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 统兵三万九百人 马二千匹。

岭南五府经略 统经略、清海二军 统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长乐经略 福州领之 统兵一千五百人。

从上述唐廷的兵制配置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天宝初年唐廷兵力以北方为重,而北方又可以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左:安西、北庭两镇,总计兵四万四千人,马七千七百匹;中:河西、朔方、河东、陇右四镇,总计兵二十六万七千人,马五万八千三百匹;右:范阳、平卢两镇,总计兵一十二万八千五百人,马一万二千匹。三部力量对比可看出,唐廷兵制为中间大,两边小,中间的河西、朔方、河东、陇右四镇乃为唐廷兵制之心腹,都城长安之屏障。若左、右发生变故,强大而稳定的心腹区亦可从容应对。而四镇节度使皆为王忠嗣,后王忠嗣虽坚辞河东、朔方节度使,但王忠嗣的个人威望犹存,从遭贬黜后哥舒翰以官爵担保为之求情可见。

### 三、王忠嗣罢黜后兵制力量变化及对安史之乱的影响

纵观王忠嗣军事生涯,其持重安边的军事思想和儒将的行事风范,在保持边疆安定和军队战斗力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载:“安禄山潜蓄异志,托以御寇,筑雄武城,大贮兵器,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既防范了安禄山谋反,又能维系了军队战斗力的例子,同时亦说明了,王忠嗣存在对安禄山起兵谋反的震慑作用。而其继任者却迎合玄宗黠武做法,造成了大批军士的阵亡,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王忠嗣罢黜后,河西、陇右节度使由安思顺和哥舒翰分别充任。哥舒翰虽在攻取吐蕃战功累累,但在个人威望和军事指挥才

能上皆无法与王忠嗣相比。这一点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得到印证。且作为都城安危屏障之将领安思顺与哥舒翰不和,史载:“初,思顺与翰分控河、陇,情甚不睦,及翰守潼关,主天下兵权,遂肆其志以报怨,诬思顺与禄山通,伪令人遗书于关门,擒之以献。思顺与弟太仆卿元真并伏诛,天下冤之。”安史叛军顷刻间攻入长安,从反面充分说明了王忠嗣的价值。唐廷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在兵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却与叛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拉锯战,更进一步体现了王忠嗣的价值。

《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四》载:“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不久,哥舒翰与杨国忠交恶,杨国忠派心腹杜乾运将将一万人,屯于霸上,牵制哥舒翰。后:“翰虑为所图,乃上表请乾运兵隶于潼关,遂召乾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从材料中可看出,哥舒翰虽为身为元帅,其统兵和军事指挥才能与王忠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差甚巨,导致主将争长,政令无所统一的局面出现。后哥舒翰指挥的灵宝战役中,轻敌冒进,二十万军队,仅剩十之一二,潼关失守,致使唐军在数量上的优势顿失。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载(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从材料中可看出,后期唐军队中无主帅,平叛后果可想而知。诚如岑仲勉论道:“不置元帅,以现必败之征,又复使昧于军旅,无功绩之阉人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牵卒之,更非败不可。”唐廷在军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却军中不置元帅,阉人观军容,主将争长,致使平叛中一再措施良机,一再溃败,持续八年之久,祸国不浅,若忠嗣犹在,历史进程的结果会是另一番情景,忠嗣能够充分保持唐军的稳定性和战斗力,那么安史之乱发生是就失去了可能性,即使叛乱发生也犹如飞蛾扑火,成为瞬间的闹剧。

### 四、结语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根据历史上诸文明命运的证据,我们必须与之战斗的女神,不是携带着致命武器的‘凶猛的必然性’,而是‘或然性’”。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否认有其自身规律和必然性,但是绝不能因此否定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局势下,会起转折性或决定性的作用,只是这些偶然因素在历史演进的必然性的光芒下有些黯然失色。

诚然,历史是不可能被假设的,有其演进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偶然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价值和作用,往往这些偶然性在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